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材建设*

■ 周亚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目的/意义]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材是图书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也是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史的重要见证。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材建设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图书馆学教育史研究，对于学科发展与建构本土特色的知识体系具有参考价值。[方法/过程]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学相关理论，从文献形成方式与知识构成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材进行整体性考察。[结果/结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材可分为翻译式、编述式、著作式三大类。三类教材出现的时间大致遵循翻译、编述、著作的先后顺序，新旧知识的关系从"平行"走向"相交"，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和本土化程度不断提升，讲求实用的总体特征显示出西方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学知识在民国图书馆学知识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提出避免学习借鉴的路径依赖、应从中国典籍文化与图书馆实践两个层面推动本土"新知"进教材、重新审视中西知识融合的适切性等建议。

关键词：图书馆学教材　民国时期　文献形成方式　图书馆史
分类号：G250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走过百年历程。总结梳理学科教育发展的历史，对于当代图书馆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推进"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民国时期形成了包括留学教育、高等专业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业余教育在内的形式多样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1]。在这一多样化教育体系之中，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其中，作为我国第一所正式的图书馆学专门教育机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将教材建设列为学校重要事项之一，除自编讲义和翻译出版教材外，还注意搜罗各地文化机关刊物，发动学生放假期间向上海、北平等各大图书馆征集建筑平面图、内外照片、各种章则表格等教学参考资料[2]。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人除选用美国或国内学者的著作作为课程教材外，还有意识地开展自编教材或讲义等本土化探索工作，如李小缘编撰了《图书馆学》等具有中西结合鲜明特色的教材[3]。除文华图专、金陵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外，师范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讲习所、函授班等各类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也伴有教材编纂实践。例如，1930 年成立的上海图书馆协会附设函授学社图书馆行政学系，延聘图书馆学专家编辑了数十小册的讲义，各组课本均有练习功课，不仅"求之东西各国，是以在外埠及东西各国之圕学专家处，均去函征求讲义"，而且"向东西各国订购最新出版之圕学书籍，随时译成华文，编入讲义"[4]，其致力于教材建设不可谓不勤。此外，民国时亦有不少面向在职馆员的培训教材，如梁格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职员训练所编《分类编目与标题之方法》、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推广部主任赵波隐所编之《民众图书馆设施法》、浙江省立图书馆所编之《图书之流通》等参考辅导丛书。不同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由于其教学对象和办学宗旨上的差异，其所用教材也具有一定的区分度，或使用通俗图书馆学著作，或直接将西文原著、译著或古典书目文献用作教材或参考书，形成了类型多样、层次丰富的民国图书馆学教材体系。

这些教材是学科知识体系生产、演变与传承的重要载体，成为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的重要见证。民国时期，刘国钧、杜定友、洪有丰、李小缘、马宗荣等图书馆学家纷纷致力于教材的编纂与建设。许多民国教材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ZDA295）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周亚，助理教授，研究员，博士，E-mail：zhouya@pku.edu.cn。
收稿日期：2022－07－29　修回日期：2022－08－28　本文起止页码：172－179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与专著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不少图书馆学著作撰写的初衷就是作为教材使用,或是向学生、馆员、民众传播图书馆学知识的普及读本,如杜定友《图书馆通论》(1925)、洪有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1926)、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1934)等。它们也最终成为图书馆学的经典文献,为中国图书馆学史留下了一笔丰富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1.2 研究思路、方法与价值

在近年的图书馆学教育史研究中,任家乐认为文华图专除采用海外图书馆学著作或原版教材外,还注重国内图书馆名家的著作,体现出兼容并包的精神[5];刘奕与肖希明梳理了李小缘等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人在教材建设方面的探索[6];张康、李卓卓采用内容分析法,将1920－1949年视为图书馆学教材的发轫及第一次繁荣时期,并按照主题类别和办学单位列出代表性教材,认为这一时期的教材建设体现出"教材体系本土化探索""教材内容实用性取向""多层次教材体系探索"等特征[7]。此外,对刘国钧、杜定友等图书馆学家的研究也多涉及其所著教材。不过,这些研究侧重于图书馆学家学术思想层面的探讨,大多并非针对教材建设本身的研究,尤其较少对民国图书馆学教材建设的整体状况进行考察。

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学相关理论,从文献形成方式与知识构成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材进行整体性考察,研究思路如下:①从文献形成方式的角度,对民国图书馆学教材进行整体分类。本文所考察的教材,既包括用于文华图专、金陵大学等正式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教材,又包括北京高师暑期讲习会、浙江省立图书馆等面向在职馆员、社会人士、图书馆学自修者的辅导读物和培训教材;②从知识构成的角度,根据其知识内容是主要属于"旧学"(传统目录学校雠学为中心的古典图书馆学知识体系)还是"新知"(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对第①步所划分的教材类型进一步细分,并选取代表性的教材进行论述;③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材建设的演进方向和总体特征进行归纳与分析,尝试回答以下两大问题:第一,在不同类型教材的发展中,新旧知识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二,民国图书馆学教材呈现出怎样的总体特征,塑造了怎样的民国图书馆学知识版图?④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代图书馆学教材建设与学科发展提出建议。

在研究意义上,本研究有助于深化民国图书馆学教育史研究,从教材层面揭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知识体系演进的历程,同时,对于当代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和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1.3 民国图书馆学教材的整体分类

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认为,根据文献内容来源,古代文献可分为著作、编述、抄纂等三大类。杜泽逊则进一步按照文献的形成方式将文献分为著、述、纂、译等类型。"著"又称"作""造"或"著作",强调的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和富于创造性的理论,如汉代以前的很多著作;"述"是"古已有之",强调的是对前人有所继承和增益,如郑玄注《三礼》,郦道元注《水经》,司马贞《史记索隐》,又称"编述";"纂"又称"辑""抄纂",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原始条文都来自于其他文献原文,不加改窜,如《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等类书,以及总集、资料汇编等;"译",就是翻译,如佛典翻译、文学翻译等[8－9]。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文献形成方式,其学术价值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结合张、杜二位先生的分类,笔者从文献形成方式的角度将民国图书馆学教材分为以下三大类型:翻译式教材、编述式教材、著作式教材。下面将分而论之。

2 翻译式教材

翻译是民国图书馆学教材的主要形成方式之一,或是原封不动的全译,或是节选多种文献、博采众长式的编译。从其知识构成来看,民国翻译式教材的知识内容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

2.1 两种代表性的翻译式教材

第一是全书的翻译。如文华图专师生的教材翻译工作。在文华图书科丛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中,便有不少是汉译教材。1927年,时任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院助理教授、后来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学院院长的苏珊·埃克斯(Susan G. Akers,1889－1984)出版了《简明图书馆编目法》(Simple Library Cataloging)。本书最初是为未受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图书馆员工编制的简明手册,着重于方向性和必要性的规则,省略了不少琐碎的业务细节,力求简洁实用,并附有术语定义、缩略词及编目参考书目[10]。沈祖荣读后,认为该书"极为简明""颇供应用""其方法为最新"[11],遂将其译出并于1929年由文华公书林出版,希望能够作为图书馆学普通教材,泽惠广大图书馆学初学者。该书后成为美国图书馆学的经典教材,于1933年、1954年等多次修订再版,除沈译本外,另有

1960 年蓝乾章选译本《简易西书编目法》。除翻译外，在文华图专的教学中，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1851 – 1931）、欧内斯特・理查森（Ernest C. Richardson，1860 – 1939）、威廉・弗莱彻（William I. Fletcher，1844 – 1917）、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经营手册》（Manuals of Library Economy）等欧美英文原版著作也常被列为各类课程的参考书[12]。

第二是节选多种文献、博采众长式的编译。如戴志骞《图书馆学术讲稿》。1920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受邀主讲的戴志骞因“关于图书馆学术之中文书籍又无善本可以参考”，加之“每日讲演数小时”，因此“不得已选择西文图书馆学术之纲领，临时译成中文，作为讲演之资料”，即成《图书馆学术讲稿》[13]。对此，金敏甫曾评价戴志骞的演讲稿“大都译自西文……其于分类编目，论之甚详。自此而后，西洋式之图书馆，遂亦散布于国内，且驾东式图书馆而上之”[14]。与沈祖荣翻译《简明图书馆编目法》不同，戴之《图书馆学术讲稿》并非原封不动地翻译一书，而是博采美英图书馆学各家学说式的编译，包括约翰・德纳（John C. Dana，1856 – 1929）的《图书馆初级读本》（A Library Primer）、约翰 – 克拉克（John W. Clarks，1833 – 1910）的《照管图书》（Care of Books）、鲍士伟（Arthur E. Bostwick，1860 – 1942）的《美国公共图书馆》（American Public Library）等。同时，戴还在讲稿中推荐了许多西文阅读书目，以供有志于深入学习研究者参考。这些西文书籍也被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等欧美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广泛地用作教材。

2.2 知识构成：西方现代图书馆学“新知”

翻译式教材的知识构成主要为图书馆组织、经营管理方面的西方现代图书馆学“新知”，注重讲授图书馆工作方法与管理的高效性，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与富有浓厚人文学术特征的中国传统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古典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大异其趣。

由于民国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将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等作为学习借鉴的对象，因而，翻译教材的选择也受到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框架的深刻影响。教材的作者——以杜威（Melvil Dewey，1851 – 1931）、卡特（Charles A. Cutter，1837 – 1903）、德纳（John C. Dana，1856 – 1929）、弗莱彻（William I. Fletcher，1844 – 1917）、鲍士伟（Arthur E. Bostwick，1860 – 1942）、克拉克（John W. Clarks，1833 – 1910）、布朗（James D. Brown，1862 – 1914）、赛耶斯（W. C. Berwick Sayers，1881 – 1960）等美英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学名家为代表，往往同时兼有图书馆学教育者和图书馆管理者的身份。例如，杜威（Melvil Dewey，1851 – 1931）同时担任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校长与纽约州立图书馆馆长；鲍士伟（Arthur E. Bostwick，1860 – 1942）兼任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学校校长与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馆长；德纳（John C. Dana，1856 – 1929）在任纽瓦克公共图书馆馆长的同时，也曾担任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院委员会主席；弗莱彻（William I. Fletcher，1844 – 1917）在担任阿莫斯特学院图书馆馆长的同时，也曾多年经营该校的图书馆学暑期学校。兼任图书馆管理者和图书馆学教育者的多重身份，使这些图书馆学家在教材的写作上往往关注其对于图书馆工作的实际价值，因而造就了翻译式教材的实用主义风格。

3 编述式教材

编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挥，并非一成不变地继承，而是有所发挥的创造。由于教材是对现有知识的吸收整理、并不讲求绝对的原创性这一特点，大量民国图书馆学教材都可归入“编述”的行列。根据其知识构成的不同，又可分为外国现代图书馆学“新知”为主的编述式教材、中国古代校雠学目录学“旧学”为主的编述式教材两大类。

3.1 外国现代图书馆学“新知”为主

杨昭悊《图书馆学》是一个典型代表。杨昭悊早期主张译书，后意识到一味翻译之不足，遂转向编书。1923 年，作为“尚志学会丛书”中的一种，杨昭悊编著的《图书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自称“（该书）十分八九是参考各名家的著述，自己也参加十分一二的意见，来比较他们的理论，联贯他们的学说”[15]，参考的著作涵盖了中文、日文、英文 3 种语种的文献，如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小识》、田中敬《图书馆教育》，英文如布朗（James D. Brown，1862 – 1914）、鲍士伟（Arthur E. Bostwick，1860 – 1942）、卡特（Charles A. Cutter，1837 – 1903）、德纳（John C. Dana，1856 – 1929）等人著作。该书体例详备，资料丰富，“为推广我国图书馆的学问起见，要使无论何人，一看就知道图书馆的原理和应用”[15]，非常适合作为图书馆学教材。该书后来多次再版，对于传播图书馆学知识贡献卓著。

马宗荣亦极为留心于教材之编撰。1921 年，在日留学的马宗荣回国考察图书馆教育，深感于适合自修和参考的图书馆学书籍“屈指可数”“不易购获”的现状，萌发了编写“通俗图书馆学”的愿望。1923 年，马宗荣“取旧有关于论述图书馆之书籍，重为推敲，钞译

其精华,再加以一己调查所得及理想"[16],撰成《现代图书馆序说》《现代图书馆经营论》《现代图书馆事务论》《现代图书馆教育论》《现代图书馆发展论》五编,并于1928年、1934年先后在中华学艺社、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等机构出版发行。马宗荣在大夏大学、暨南大学讲授图书馆管理法课程时,便以《现代图书馆事务论》(1934)作为教本。此外,《现代图书馆经营论》(1928)也被上海清心中学图书馆学科等用作课本[17]。担任大夏大学图书馆馆长时,马宗荣还专门为"本馆馆员中之未受过图书馆学训练者"编写了《大学图书馆经营之实际》,"举凡馆内之行政组织,委员会之组织,图书之选择、订购、登记、分类、编目、排列、整理、贷借及点检诸方法,均记载甚详"[18],成为在职馆员和图书馆学初学者的参考书。

无论是杨昭悊《图书馆学》,还是马宗荣《现代图书馆经营论》等教材或参考书,其主要知识构成实为外国图书馆学"新知",但又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整合加工,是教材中国化的初步尝试。

3.2 中国古代校雠学目录学"旧学"为主

在民国"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下,姚名达、郑鹤声、汪辟疆、胡朴安、钱基博等学者纷纷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校雠学、版本目录学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总结,催生了《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目录学》(1933)、《版本通义》(1933)、《中国目录学史》(1936)等学术经典,其中不少都是这些学者长期教学的成果。例如,汪辟疆于中央大学讲授目录学之时,鉴于对讲习者"每苦无专书以供教程""辄取《汉书·艺文志》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录》等用代教材"的不满[19],遂自撰《目录学研究》(1934)以供教学之用;又如,胡朴安曾于上海国民大学讲授古书校读法等课程,在沪上任教的基础上,朴安与其侄胡道静合撰《校雠学》(1943)一书,"初学得此,亦可得校雠学之大概。"[20]按今日一般标准来看,这些学术经典应当被归入独创性的著作范畴。不过,从文献形成方式角度来看,对于古代文献整理方法的总结,显然是古已有之、有所继承增益的工作。将其归入编述的范畴,也丝毫并不减损其学术价值。这些近代化的校雠学目录学论著,为图书馆学及相关课程提供了教材或参考书,如钱基博《版本通义》就被文华图专列为版本学课程参考书,从而使传统目录学、校雠学知识成为近现代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编述式教材相结合,文华图专还注重在学习原著的过程中继承古代典籍文化和校雠学学术传统。例如,中国目录学课程除使用清代湖北存古学堂李哲暹先生所编讲义并有所扩充修改外,还将《崇文总目》《经籍考》《四库全书提要》《直斋书录解题》《书目答问》等古代官私书目列为教学参考书;为了使学生熟悉中国历代版刻源流及不同版本特点,版本学课程将叶德辉《书林清话余话》、江标《宋元本行格表》、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邵懿辰《四库简目标注》等列为参考书;中国图书馆史略课程所列参考书包括历代艺文志及百官志、《文献通考》及《玉海》等[12]。课程讲义与古代官私书目、目录学名著等参考资料结合在一起使用,使学生既能理解版本目录学的理论,又能对中国古典目录的编制体例、古代典籍文化和校雠学学术传统产生直观感受,便于书目提要与题跋的撰写、版本鉴定等经验方法的学习。

4 著作式教材

可称之为著作式教材或专著式教材,强调的是前所未有的成果。根据其知识构成的不同,著作式教材可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对于西方图书馆学知识的本土化改造;第二,基于中国图书馆实践的理论与方法总结,本土实践催生出本土新知;第三,西方图书馆学"新知"与中国传统校雠学"旧学"的融通之作。总而言之,其知识构成未超出"新知+旧学+本土实践"的范畴。

4.1 对于西方图书馆学知识的本土化改造

沈祖荣、毛坤、徐家麟、汪长炳等文华图专教师编写的课程讲义,推动了西方图书馆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目录学校雠学的现代化。1916年,沈祖荣就在美国《图书馆杂志》发表题为《美国图书馆制度适用于中国吗》(*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的文章[21],对能否照搬美国图书馆模式进行了思考。民国时,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改造成为图书馆学人热衷的研究工作,也证明了西式图书馆学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1917年,沈祖荣与胡庆生合著《仿杜威书目十类法》由圣教书局出版,后沈祖荣与胡庆生对于该分类法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以求西学"新知"能够适用于中国实践。"仿杜法"也随之成为文华图专的教材。

不仅是文华图专,非正式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也催生出一些著作式教材。1925年1月,洪有丰在《图书馆组织与管理》的序言中写道:"然观吾国图书馆学之译著,尚寥若晨星,将何以为取则之资?而求事业之发达,效果之昭著,犹南辕而北辙也。"[22]本着促进图

书馆事业发达的目的，在亲友学者的多次请求下，洪有丰将其东南大学暑期图书馆讲习科的授课讲稿交由商务印书馆于 1926 年正式出版。该书尤其注重从中国图书馆实际情况出发，而不简单套用欧美或日本方法，如对于书籍庋藏方法，“本编力矫舍本逐末之弊，于中籍处理方法，叙述尤详，期可有实际之应用也。”[22]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学界高度评价。例如，金敏甫 1928 年称“最近洪有丰氏，本数年来办理中国图书馆之经验，以及教授之心得，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1926)一书，此为中国图书馆学之创始。”[14]

4.2 本土实践催生出的本土“新知”

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先生发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时代强音，影响深远。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民国图书馆学人植根于中国实践，试图从中培植出不同于西方图书馆学的本土“新知”。其中，徐旭所撰民众图书馆学系列著作，是不可忽视的本土图书馆学教材。1929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曾对无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的图书馆学课程及教材作了报道：“自本学期起，添设图书馆学一课……由该处图书馆主任兼图书科实习指导员徐旭担任教授，用徐君自编讲义，特别注重于讨论实际问题及专门工作之实习云。”[23]徐旭极为反对“所谓整个西洋化之方法”，本着“试验的态度、研究的精神”，“将民众圕在行政、管理、设备、阅者，以及推广事业各方面所得的结果陆续编成小册”[24]，汇聚成《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31)、《民众图书馆学》(1935)、《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1935)、《图书馆与民众教育》(1941)等系列著作，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民众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徐旭所著教材主要来源于中国本土图书馆实践经验、试验与调查研究所得，可谓自成“一家之言”。力主教育中国化的著名教育学家庄泽宣，对于徐旭极为赞赏：“今之谈圕学者每钞袭异国，余夙主教育中国化，圕学固非例外，固欣然促其付梓。在中国办圕已与外国不同，办民众圕尤然……余深信未来之中国教育必将以民众教育为主体，而民众圕又将为民教中心。”[25]在《民众图书馆学》(1935)一书中，虽然徐旭自称并未经过系统的西方图书馆学训练，“既无宗派，又无传统，其内容免不了东鳞西爪，七拼八凑”，“若用研究圕学的一般眼光来看，那末有些在圕理论上讲，是没有根据的；有些在圕方法上讲，是不适常道的”[25]，但书中经过实验民众图书馆的实际“实验”得来的内容，尤其具有较高的独创性。在《图书馆与民众教育》中，徐旭还将自己在上海的实际调查所得——《上海小书摊调查》与《上海小报摊调查》两种材料——附录于后，以作为教学参考[26]。

这种通过实际调查、实验等方法，从而在本土实践中产生本土知识的教材生产方式，丰富了图书馆学“新知”产生的路径。这类“新知”已不同于通过翻译等方式引入的西方图书馆学“新知”，而是真正在本土实践中培育、经本国学者总结、提炼、升华的本土“新知”。这一点对于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有着不凡的意义。

4.3 西方“新知”与中国“旧学”的融通之作

杜定友曾大力呼吁广大图书馆同仁“一方面输入西洋新兴科学，一方面改造我国固有方法。使蔚为大观，创造中国新图书馆学”[27]。杜氏在这里所称“创造”，即是建立在融通西方“新知”与中国“旧学”的基础之上。民国时期许多图书馆学人都曾为之做出过艰辛的努力，如程伯群和毛坤。1935 年，程伯群在世界书局出版《比较图书馆学》(1935)，“采取东西图书馆学之所长”“示其纲领而作综合之比较”[28]，既注重对西方图书馆学方法的介绍，如编目、分类、索引、保管、装订、标题等实用方法，又肯定了中国目录学、校勘、版本等传统图书馆学知识的价值。毛坤是民国时期积极致力于图书馆学教材建设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编写的讲义包括《目录学》(1936)、《中国目录学》(1936)、《中国史部目录学讲述大纲》(1936)、《中国史部目录学》(1948)，尝试融会中西目录学精华，构建了富有特色的目录学体系，其思想“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方的观点，但其本源仍是中国传统目录学思想”[29]。

不过，对于“新知”与“旧学”的融通并不容易，正如陈训慈所说：“四部十进交相为病：竺旧者鄙十进之模拟西说，好新者则又尽弃旧法之精义而不顾，或复调停其间，实未能折衷其义意。”[30]西方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学极为讲求效率、方法、实用，而中国古典图书馆学则有着非常强烈的人文学术色彩与中国文化精神内核，当两者相遇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不适应。不同国家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是不同文化之下的产物，因此，不同知识体系融合的深层次意蕴实则是不同文化的融合。中西学术和文化的异质性使二者很多时候仅停留在“并立”而非有机融合的层面，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梁启超)或“中国新图书馆学”(杜定友)的使命在民国教材层面并没有彻底完成。

5 讨论与总结

5.1 演进方向:在新旧知识关系的变化中增强本土化程度

在这3类教材的发展中,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知"的关系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二者关系的变化可以反映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演进历程:①翻译式教材或为全书的翻译,或为节选多种著作、博采众长式的翻译,其知识构成主要是实用主义的西方现代图书馆学"新知",在中国古典目录学知识等"旧学"之外,极大地丰富了民国图书馆学知识体系。此时,西方"新知"与中国"旧学"是两条相互独立的"平行线";②编述式教材,其知识构成或以外国现代图书馆学"新知"为主,或以中国古代校雠学目录学等"旧学"为主。此时,"新知"与"旧学"仍然多处于各自独立存在的"平行"关系;③著作式教材,或是在中国的实践场景中对于西方图书馆学知识的本土化改造,或试图在深层次融通中国"旧学"与西方"新知"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知识体系。此时,"新知"与"旧学"的关系从"平行"走向"相交",并试图实现两种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

同时,从翻译到编述再到著作,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和本土化程度不断提升,与中国本土图书馆实践与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不断增强。这从3类教材出现的顺序可见一斑。3类教材出现的先后时间大致遵循翻译 - 编述 - 著作的纵向演进方向,这不同于张舜徽先生认为的古代文献先出现著作(汉以前)、后盛行编述(汉到隋)的发展规律[8]。究其原因在于,近现代图书馆学带有强烈的外来属性,因而先有翻译之作、广采他说的编述之作,后有融通中西、成一家之言、自成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材建设的历程,反映出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艰难努力。

5.2 总体特征:讲求实用与民国知识版图

讲求实用是翻译式教材、编述式教材、著作式教材的总体特征。正如本文第2部分所指出的,翻译式教材主要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著作。1933年,沈祖荣在章新民所译教材《民众图书馆的行政》(Public Library Administration)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若是把这本书来看,就知道图书馆应怎样去管,图书馆工作应怎样去经营才能有效,经费才不致于虚费了。"[31] 同样,其他两类教材也体现出明显的实用取向。例如,杜定友为师范学校图书馆学课程编写的教材《学校图书馆学》,"所述各种办法专为小规模之中小学校图书馆立言,故手续极为简单,无专门学识者亦可依法照办"[32]。即使是阐发图书馆学原理的通论性著作,作者往往亦希望能为图书馆学生及其他人自学提供入门参考,而不至于因内容的过度艰深晦涩令人生畏。例如,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本是作为中华书局《中华百科全书》之一种,目标群体为中等学生及一般青年,因此本着"行文生动,易于了解,务期能启发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的原则,以求能够"指导他们进修"[33]。《图书馆学要旨》以阐发说明图书馆学原理为主,其行文通俗易懂,善用提问的方式引起读者兴趣,如"怎样说现代图书馆是自动的呢""怎样说现代图书馆是民众化的呢""怎样说现代图书馆是社会化而非个人化呢"等,充分体现出刘国钧先生为文善于说理、深入浅出的语言特点。同时,每一章后面还附有问题和参考书,以深化读者对于内容的理解和拓展学习,便于初学者学习。

民国图书馆学教材讲求实用的总体特征,显示出西方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学知识在民国图书馆学知识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在翻译教材大量引入、留美学人归国、新式图书馆对现代图书馆管理知识的迫切需求等因素的推动下,外来"新知"逐渐在民国图书馆学知识版图中日趋中心化,在培养图书馆人才、普及图书馆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而以校雠学、目录学等"旧学"为中心的中国古典图书馆知识体系则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不过也要看到,徐旭等学者基于中国图书馆实践生产本土"新知",毛坤等学者尝试融通中国"旧学"与西方"新知"的努力,扩大了民国图书馆学知识版图中本土知识的比重。

5.3 结语

本文从文献形成方式的角度将民国图书馆学教材分为翻译式、编述式、著作式三大类,根据知识构成的不同对各类型教材进行了细分,并选取代表教材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指出,在民国三大类图书馆学教材的发展中,"新知"与"旧学"的关系从"平行"走向"相交",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和本土化程度不断提升;同时,民国图书馆学教材讲求实用的总体特征,显示出西方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学知识在民国图书馆学知识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当然,本文的分类只是一种尝试,也未必能够全部涵盖民国所有的图书馆学教材,对于有些教材的归类,不同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纵观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材建设的历史,对于未来图书馆学教材建设、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不无启

示意义,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避免学习借鉴的路径依赖。民国翻译式教材与编述式教材的很多内容主要来源于美国,当然,这与民国时期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程度、留美学人居多等因素是分不开的。然而,这事实上造成了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笔者曾经指出,这种"路径依赖"有可能忽视图书馆学教育作为文化事业的多样性与学科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导致教育模式的单一性[34]。民国教材整体的实用取向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点。1927年以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在乔治·沃克斯(George A. Works, 1877－1957)、路易斯·威尔逊(Louis R. Wilson, 1876－1979)两任院长的带领下,高举科学研究的旗帜,出版《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udies in Library Science*),推动了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及其与社会科学的融合[35]。然而,芝大的图书馆学科学化探索,尤其是其代表性成果《图书馆学研究丛书》(其中不少是教材),并未对民国图书馆学教材建设和学科转型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这一"历史的错位"值得我们深思。在iSchools运动再次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的今天,有必要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不同模式及其他国家学科教育的多样性给予更多的关注,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路径依赖"对于学科的伤害。

其次,从中国典籍文化与图书馆实践两个层面推动本土"新知"进教材。在学习借鉴他国"新知"之外,未来图书馆学教材建设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吸纳本土知识:一方面,除继承传统校雠学目录学的思想遗产外,选择近年间图书馆学及相关学科(如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献编纂学、辑佚学、方志学、书籍史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写入图书馆学教材内容;另一方面,立足本土实践并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中,总结梳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最新实践成果和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促进更多的本土"新知"进入图书馆学教材。

再次,重新审视中西知识融合的适切性。在民国教材建设中,图书馆学人努力致力于西方"新知"与中国"旧学"的融通。然而,正如本文所指出的,东西方不同知识体系的融合实则是不同文化的融合,要做到有机融合而非生硬拼凑,其难度可见一斑。无疑,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需要建立在中外融通的基础上,那么,应采取怎样的融通之道?已有的工作是否忽略了学术知识所处的文化环境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例如,若剔除中国目录学所带有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禀赋,只以技术方法的视角去看待它,并将其与讲求实用、效率的西方目录学和分类编目方法简单整合,可能反而会损伤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因此,在图书馆学教育史、学术史、学科史的研究中,需要对中西知识关系及二者融合的适切性进行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 李明杰,李瑞龙.民国图书馆学教育体系考述[J].图书情报研究,2018,11(3):78－86.
[2] 校闻及同门消息:(三)征集参考材料[J].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7,9(1):145.
[3] 刘奕,肖希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4):111－118.
[4] 陈伯逵. 本会圕学函授社告全国圕界同志及留心永久专门职业者[J].上海圕协会会报,1930(2):41－43.
[5] 任家乐.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191－193.
[6] 刘奕,肖希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4):111－118.
[7] 张康,李卓卓.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建设百年历史演变[J].图书情报知识,2021,38(4):27－40.
[8]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3－26.
[9]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36－58.
[10] AKERS S G. Simple library cataloging[M].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7:5－6.
[11] 爱克斯. 简明图书馆编目法[M].沈祖荣,译.武昌:文华公书林,1929:沈祖荣序.
[12]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1935)[G]//王余光,范凡.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16.
[13] 戴志骞. 图书馆学术讲稿[J].北京高师教育丛刊,1923,3(6):1－67.
[14] 金敏甫.中国图书馆学术史[J]. 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8,2(2):1－14.
[15] 杨昭悊.图书馆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凡例, 10.
[16] 马宗荣. 现代图书馆序说[M].上海:中华学艺社,1928:序.
[17] 清心中学圕学班之发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6(4):22－23.
[18] 马宗荣. 大学图书馆经营之实际[M].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1934: 马宗荣序.
[19]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序.
[20] 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序.
[21] SENG S T. 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 [J]. Library journal, 1916,41(6):384－389.
[22] 洪有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洪有丰自序, 凡例.
[23] 无锡之图书馆学教学[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5

(3):32.
[24] 徐旭. 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M]. 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实验民众图书馆,1930:丛书序.
[25] 徐旭. 民众图书馆学[M]. 上海:世界书局,1935:庄序, 自序.
[26] 徐旭. 图书馆与民众教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序.
[27] 俾沙普. 现代图书馆编目法[M]. 金敏甫,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杜定友序.
[28] 程伯群. 比较图书馆学[M]. 上海:世界书局,1935:自序.
[29] 彭敏惠. 毛坤对目录学的贡献与影响[J]. 图书馆建设,2014(10):92 - 95.
[30] 金天游. 图书之分类[M]. 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1936:弁言.
[31] 亚当. 民众图书馆的行政[M]. 章新民,译.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34:沈祖荣序.
[32] 杜定友. 学校图书馆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例言.
[33]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M]. 上海:中华书局,1934:舒新城总序.
[34] 周亚,肖希明. 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问题、方法与使命[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45(5): 112 - 125.
[35] 周亚.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研究(1887 - 1955)[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学林出版社,2018:223 - 274.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extbook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 – 1949)

Zhou Ya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Library science textbooks are not only important carriers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systems, but also important witness of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 – 1949). This study research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extbook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tribute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education and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thod/Process**] Usi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philology, the paper had made a holis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textbooks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ocument 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omposition. [**Result/Conclusion**] Library science textbook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ranslation style, compilation style and creation style. The time of appearance of the three types of textbooks roughly follows the sequence of translation, compilation and wr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and old knowledge changes from "paralleling" to "intersecting". The degree of autonomy and localiz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s improved.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ity are presented among these textbooks, which show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western especially American library science knowledge in the territory of library science knowledge. Furthermore,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avoiding the path dependence of learning and reference, promoting the local "new knowledge" into the textbook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 culture and library practice, and re-examin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textbook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 – 1949)　document formation styles　library history